

文史大观



开放新涌浮阳江
红色基因铸铸铸铸铸铸铸
红军电台的诞生
外侨在庐山的艰难岁月
吉安古代名人传记序

一九九六年第三期(总三期)

顾 问: 吴永乐 戴执中
江国镇 厉志成
总 编 辑: 周奎书
副 总 编 辑: 甘炳文 罗炎卿
陈文华 桂水金
万德恺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朱安群 朱宗奎
杜伊力 李国强
李天侨 杜德凤
吴吉如 吴志清
俞向党 俞兆鹏
袁 牧 夏逢南
彭适凡 熊桂花
执行编委: 陈文华 杜伊力
李国强
编辑部主任: 曾 粮
副主任: 喻民昆
助理调研员: 胡群红
刊 名 题 字: 康 庄
责任编辑: 张克勇
美术编辑: 李庆明
编 务: 涂苏中 雷心刚
黄 茜 易芳霖
蒋文澜

协理与协办单位

(按协理姓氏笔划为序)

万里扬 江西桑海企业集团
王贤才 江西省文史研究馆
王 翔 九江民生实业有限公司
李天侨 江西省基督教“三自”爱国会
余修炎 江西共青垦殖场
张先仁 江西赣江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胡飭海 赣新电视有限公司
熊桂花 江西京西工贸公司
欧阳效芳 江西赣南金达有色金属矿产品有限公司
江西省东乡县农业生产资料公司

主办单位: 江西省政协学习文史
委员会

编辑出版: 《文史大观》编辑部

地 址: 南昌市叠山路 289 号

电 话: 6801814 68038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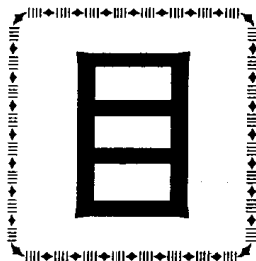
邮 编: 330008

照排印刷: 中共南昌市委印刷厂

江西省报刊准印证: 刊字第 01——059 号

定价: ¥3.60 元

2057/4P



1996 年第 3 期(总第九期)

京九沿线

- 4 开放潮涌浔阳江 陈耀坤

峥嵘岁月

- 8 光辉的四十六年
——政协江西省委员会发展历程纪事 罗炎卿
- 13 八一起义丰碑永远矗立在人们心中 郑传云
- 16 苏区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 刘国盛 冯 都
- 19 血战东山
——红军长征前一次阻击战 范贤儒 陈云源

抗日烽火

- 20 外侨在庐山的艰难岁月 熊侣琴

赣籍将星

- 22 红军电台的诞生
——记刘寅和他的通讯事业 李训寅

史海钩沉

- 26 《吉安古代名人传》序 周銮书
- 28 “昔年鼙鼓震南天”
——李烈钧与“云南起义” 张镜渊
- 31 关心民瘼的朱轼 万克荣
- 33 朱元璋与陈友谅鄱阳湖之战打了多久 黄长椿

史迹探幽

- 34 钟震川与辛亥萍乡光复 钟 亦

当代学子

- 38 跨越四学科 获得七学位
——记著名学者胡述兆博士 胡述文

海外星云

- 40 创“寄体汰脱定理”、“统一粘性定理”的当代杰出科学家钟焕成博士
..... 黄明霞 李德培

委员风采

- 42 罗边情结
——记南康市政协主席、罗边工程总指挥蒙承垠 王功仟 李立生

宗教万象

- 43 朱德寻访诺那塔 叶 平
44 悲愤而后学
——记杰出佛教学者欧相竟无 明 栋

企业之星

- 48 江西“三资”企业的明星
——记安德利集团在中国的第一家投资企业和它的老总朱宏干 ... 李庆明 江德作
50 赣南，闪烁着一颗私营企业明星
——记赣南金达公司董事长欧阳效芳 黄裕华 许志辉

影艺之窗

- 52 著名电影导演陈方千 黄人仁
53 郁达夫佚诗一首 胡迎建
49 白鹿洞书院感赋 刘显族
54 白云山公园冬季花展掠影 罗炎卿
54 荷之美 邓克强

同舟共济

- 55 多党合作谱新篇
——记民革靖安县支部 舒 远

人杰地灵

- 57 八一桥史话 甘炳文 周康健

历史足音

- 59 俩情互勉共相知
——陈立夫为刘子暎诗文集题签 罗长安

文化天地

- 60 回忆民国时期的高等文官考试 徐莫磐

文史随笔

- 61 石钟山漫记 董建民

封面人物

- 63 欧阳修简介 刘国盛 徐荣辉

开放潮涌浔阳江

◎陈耀坤



1987年原九江市委书记兼市长，现任省政协副主席江国镇同志(右三)陪同我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左二)视察九江长江大桥工地。

一首千古绝唱的《琵琶行》诗，使得浔阳江扬名天下，而今改革开放，又使得浔阳江蜚声四海。乘改革开放的风帆，浔阳江正从内河走向世界；前途无量的九江，已踏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征程！

1986年11月21日至25日在九江港口公寓召开的长江沿岸十二个港口城市经济研讨会上，中共九江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江国镇同志作了题为《面向长江开发九江》的专题报告。他在报告中，对长江在我国经济中的作用和九江港的战略地位、区位优势、发展前景与港城关系等，作了很有说服力的科学分析。受到了120余名到会专家 and 实际工作者的好评。说他“是一位有开拓精神的好干部，也是一位有远见的开拓者”。

为了适应改革开放时代的要求，顺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人们在主观上既要树立超前意识，又要有科学的行动规划。因为，没有超前意识，就没有远见；而没有科学的行动规划，就没有奋斗目标。远大理想的实现始于脚下。九江人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以“面向长江开发九江”的超前胆略和务实精神，把九江经济和港口发展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并为我们留下开拓者不朽的足迹。

在人们作出“面向长江开发九江”决策后的第六年，即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不久，党中央作出了“以上海浦东开发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

市”的决策，加深了人们对开发九江的认识，也加快了九江开放开发的步伐。开放开发中的长江热潮，更使“奋飞京九之间，崛起鄱阳湖畔”的浔阳江，进入开放开发的前列。时间在流逝，但人们并没有忘记开拓者走过的足迹。在这之中，人们始终不会忘记包括江国镇同志在内的创业者们，所作出的努力。在此，我们仅叙述发生在浔阳江畔的三件事：

一、市政府的“军令状”

上海海兴轮船公司“新华5号”轮，1980年4月1日启航离开浔阳江直驶香港，结束了九江港没有外贸进出口运输业务的历史，并使九江市的对外贸易和开放，走进实质性的一步。正因为如此，在客观上对港口提出了建设外贸码头的要求。为了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九江港务管理局早在1983年就编制了外贸码头工程可行性报告，1985年4月交通部批准设计计划任务书，1986年1月交通部批准九江港外贸码头工程的初步设计，并要求同年9月开工建设。

可是，就在九江港外贸码头将要进入施工的前夕，遇到了两个不好解决的难题：一是由于条块管理的矛盾，在码头选址上出现了麻烦，以致动摇交通部投资建港的决心。刚到任不久的江国镇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亲任建港领导小组组长，立即召开会议进行研究。他紧紧抓住这个机遇不放，一方面到南昌争取省有关部门的支持，一方面到北京找交通部部长

说明情况,保证按原计划建港。在交通部提出“当年开工,三年建成”的要求时,九江市人民政府向交通部立下了“军令状”：“1987年4月底前做好搬迁腾地工作”。就是说,要在8个月的时间里,将14085平方米内的11个单位和115户居民,全部动迁出去,并做好安置工作,而拆迁费仅400万元包干,其余归地方,超支由地方政府支付。这个前所未有的“军令状”,确实打动了交通部有关部门领导和部长的决心。他们想“那有这么便宜的事”,遂决定在海港建设费中拨5670万元给九江建港。九江人更高兴,这个关键时刻的关键行动,使九江搭上了“开放长江沿岸城市”的快车,并为呼应上海浦东开发作了必须做的前期工作。

建设外贸码头的另一个难题是拆迁,建两个500吨级泊位的外贸码头,占用港区岸线300米,陆地面积41000平方米,建筑总面积30538平方米,需要拆迁原有的建筑物达8000余平方米。在这8000余平方米的旧建筑物中,有单位用房和居民住房。难就难在有的单位要价很高,开口就要28万元,否则不搬;有的单位一面拿拆迁费,一面又把职工往内迁,以图拿到更多的拆迁费;居民中的钉子户,更是不好对付的对象。所以,负责拆迁的干部说:“怎么搞的,拆迁户越拆越多,要价又高得惊人,真难!”于是形象地说:“拆迁难,难于上青天!”据当时测算,仅拆迁费就要突破一千万元。建设中的外贸码头面对拆迁难题,使九江市人民政府在北京定下的“军令状”,受到了威胁。在困难面前,是知难而进,还是知难而退?九江人没有退缩。因为,退路是没有的,外贸码头已列为九江重点建设工程,必须保证顺利进行。为此,江国镇同志数次召集建港领导小组开会,研究对策,还亲自找有拆迁任务的单位领导谈话,要他们顾全大局,不要只打小算盘。并严肃地指出:只准让路,不准设置障碍,说“这是一条纪律,谁也不能违抗”。就这样,硬是把一块块硬骨头啃下来了。结果,不仅提前二个月完成了拆迁任务,而且在拆迁包干费中,还节省了40万元,为外贸码头建设铺平了道路。

九江外贸码头,在建设按照“施工生产两不误”的要求,做到了边建设,边生产,边施工,边验收,在1986年9月16日开工至1990年9月12日全面验收期间,海轮照常进港作业,生产一直没有停止。在这四年中,有73艘外贸海轮进港作业,累计运送进出口物资达30.45万吨。同时,还承接了大批内贸货物进出口任务,在港口经济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资料表明,九江港自开放以来,已接纳了221艘外贸海轮进港作业,过境港口的外贸进出口物资达90.74万吨,从而增强了九江市在长江沿岸的口岸地位。

二、改建客运港区

在长江沿岸,九江虽然只是个中等城市,但港口客运流量并不少于大城市,并一向高于南京港。以港口旅客发送量为例,1985年九江港已达229.6万人次,1988年又增至249.3万人次,增长8.58%。可是,港区却十分狭小,只有一个700平方米的候船厅。年过境能力仅30万人的客运服务设施,给过境于九江港客运港区的旅客造成了极大不便。水上泊位也严重不足,大型客轮泊位仅两个,使到港船舶不得不在江上等候待泊。对于这种严重制约港口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谁也不会安于现状,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人们更不会坐失良机。客观的需要,只有经过主观的努力,才能使主观和客观达成一致,并推动港口经济的发展。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不仅需要有一个勇敢的开拓者,更需要有一个果断的决策者。当时,作为九江市“一把手”的江国镇同志,起了开拓者和决策者的双重作用。

为了改变客运港区狭小,旅客过境拥挤,不适应港口经济发展的状况,经多方论证后认为,彻底改变现状,首先要实施填江、移堤、扩路工程,扩大港区陆域面积;然后修建包括水上和陆域在内的客运码头,以适应开放口岸和旅游城市发展的需要。决策下定之后,就是实施的问题了。然而,实施决策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实施填江、移堤、扩路工程,虽然可以使客运港区增加5万平方米的陆域面积,但需要投资2509万元,并且还要搬迁9个客运码头,33个单位,117户居民,拆迁原有建筑物28541平方米。这个客运港区改造的一期工程,虽然不是九江最大的重点工程,但由于涉及面广,动迁任务重,居民安置量大,时间要求紧,所以,工作难度也相对大。

九江客运港区工程,西起龙开河口,东至上矶弯,全长1100米,宽30至35米,于1986年11月正式动工,1988年5月基本完工,共填进27.04万立方米红土,投入25.68万吨砂石料,是当时九江市30个重点工程中,风险最大的工程。因为,拆旧堤建新堤,必须在洪水到来之前完成。这样,在半年时间里,必须完成填土修堤任务。不然,长江洪水就会威胁全市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对于所有这一切,除需要听取各方面专家意见和进行



乔石委员长、吴官正省长视察九江港

科学论证外，还要“一把手”拍板，其风险当然不言自明。

可是，建设资金又从那里来？为了筹集资金，只有作为市长的“一把手”亲自出马才好，并且要在开工之前，把钱弄到手。经过市长办公会研究，认为九江财政难以全部解决这个工程资金。决定先投90万元抛石填江，并利用开山，新建长虹大道的30万土方移堤同时，为了尽快筹集到工程启动资金，决定江国镇同志亲自去北京，找交通部钱永昌部长和黄镇东副部长，请求交通部在港口建设费中给予资助。由于他们已打过多次交道，认为“九江市长是个干实事的人”，况且又是用于港区基础性建设，因此决定向九江投资800万元，并先拨20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在取得交通部的支持后，江国镇市长又即刻到南昌，向江西省领导汇报，要求给予支持，省计委亦同意向九江市投资800万元，不足的资金则由九江市人民政府自行解决。有了这两笔资金，再加上九江市逐年自筹部分，使客运港区改造工程，有了资金保证，并由九江市建港指挥部组织实施。后来在实施中，由于注意节省，各方面开支“抠得紧”，全部工程共用资金2180万元，比原计划节省了300余万元。

交通部启动资金到位后，施工的第一步就是拆迁，其难度比外贸码头还要大。因为，人们都不愿意搬出这个黄金地段。特别是轮渡码头，由于历史和习惯的原因，隶属于湖北省黄陂县小池镇的部分群众，在九江大闹浔阳江头，引起纠纷。后来，在国务院的关怀下，经两省领导多次协商和耐心工作，才同意将码头搬迁到新的停泊处。对个别钉子

户，也采取了强硬措施。如此，不仅为九江客运港区改造争取了时间，也为修建新的客运大楼等设施，争取了宝贵时间。在九江修建一座可满足年通过能力500万人次的客运设施，1984年就进行了设计和可行性研究。客运港区改造工程完成后，为新建这个客运设施打下了基础。江国镇同志调省政府工作时移堤填江扩路工程基本完成，这个工程中码头和大楼尽管尚未开工，但他还是十分关心这个在长江沿岸也是重点工程的前期工作，

并多次察看客运码头各项设施的模型和图纸。钟起煌同志在任九江市委书记时，为了使这个工程尽早完成，也抓得很紧。江国镇同志在客运码头建成投入使用后，也还多次站在浔阳江头，面对新的客运设施，露出满意的笑容。因为，他看见了自己倾注过心血的工程，现在终于结出了硕果，发挥了效益。

九江港新的客运码头，由水面和陆域两个部分组成：水面占用岸线473米，由原来两个泊位增加到四个泊位，设有90米趸船四艘，可同时停靠四艘5000和3000吨级大型客轮上下客作业；陆域面积16000平方米，建有总投资2500万元、总面积12360平方米、长291米、高15米的三层客运大楼，两小时聚集旅客量可达5715人次，保证旅客来得了，走得好，不拥挤。当前，仅这四个泊位，每日即接纳泊港作业客轮18艘次。如今的浔阳江港区内，建有各类码头53座72个泊位，近万艘各类轮船进港作业，为发展港口经济和充分发挥九江旅游城市的港口优势，创造了优厚条件。

三、为大桥呕心沥血

在九江市的30个重点工程中，九江长江大桥应该算是重中之重了，也是世人注目的大项目。但是，由于十分复杂的原因，于1973年12月26日正式动工的九江长江大桥，到1980年时才完成全桥基础工程，1986年时也只完成两岸铁路和公路引桥基本架桥任务。人们翘首以待的大桥何时建成？九江人更显得焦虑。

我们已经进入改革开放年代，1997年对香港行使主权，也已成为定局。客观大气候已经提出了要

求：九江长江大桥是京九线上的最长跨度最大的桥，不仅要修，而且还要加快建设，以适应九江作为小京九大京九线的中心促进九江开放开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基于这一企盼，刚担任九江市委书记兼市长不久的江国镇同志，为了引起中央决策层的重视，进一步推动大桥建设，于1985年11月间，以九江市人民政府的名义，在北京邀请茅以升、钱伟长等著名桥梁专家和经济学家近百人，组成专家顾问团，来九江开论证会。专家的论证，不仅使九江人鼓起了信心和勇气，也使大桥的建设有了转机。同时，以此为契机，将推动九江市的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

论证会以后，江国镇同志于1986年8月间，冒着炎热，率领副市长许杰夫和政府有关人员等7人，带着专家论证的材料和市政府《关于九江长江大桥建设问题汇报》等，再一次去北京找许德珩、茅以升、焦若愚和国家计委、交通部、铁道部、国务院副秘书长等，向他们汇报九江大桥建设情况和九江市人民的企盼，并提出建桥要求，以取得中央决策层对大桥和九江经济建设的关注。

功夫不负有心人，九江人的企盼终于有了回报：人们听到了我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的权威性表态：“九江大桥不能停建”。并说：“在铁路未通之前，可以先发挥公路的作用”。

丁关根表示：要抓京九铁路，九江长江大桥要上马。

九江大桥上马起关键性作用的还是千方百计请来了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前来九江视察九江大桥，1986年11月万里在当时省委、省政府领导万绍芬、蒋祝平、市委江国镇同志陪同下进行了视察。作为分管交通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同志当即表态

说：大桥要上马。并进一步说：这座桥不上损失更大，要克服困难，奋勇前进，坚持改革，加快发展。以后还为大桥写了“九江桥上马意味着京九线上马”。并认为“是九江桥给京九线带来了大好形势”。

1987年4月4日，经国务院批准后，国家计委正式发文决定：恢复九江长江大桥建设。此后，九江长江大桥和大京九线建设，都走上了快车道。

1989年11月10日，九江长江大桥北岸拉开了钢梁架设序幕；1992年5月18日完成大桥钢梁架设任务，全桥正式合拢；1993年元月公路桥建成，并正式通车；1994年8月铁路桥完成铺轨任务；1995年5月31日一列满载煤炭的货车从合肥西站出发，经九江长江大桥直奔福建，首开列车分流；1995年11月16日大京九铁路全线铺通，在九江市举行了庆祝大会；1996年元月1日阜阳至九江段分流试营运成功；1996年2月12日南昌至合肥的首次客运列车平稳地通过九江长江大桥。现在，九江长江大桥已经发挥了经济效益，每日都有7对以上列车通过，并以高姿态的雄姿，迎接今年9月1日京九全线正式营运！

江国镇同志提出的“面向长江开发九江”及其开拓与务实精神，已把浔阳江的开放开发引向深入，并改变了浔阳江的面貌。

面向长江，当年九江的30个重点工程，现在正在发挥效益；

面向长江，昌九工业走廊建设，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面向长江，九江开发区的开放开发，已经走过了四周年！

面向长江，外籍轮进港作业，增强了九江港的口岸地位；

面向长江，昌九公路已经建成并又扩幅通车，结束了江西省没有高等级公路的历史；

面向长江，浔阳江畔的九江石化总厂，改变了浔阳江的生产格局。

开放的浔阳江，在“以上海浦东开发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中，将以更加辉煌的业绩，展现在世人面前！

（作者系九江港务管理局原港史办主任、九江港口协会副秘书长、九江市人民政府特邀经济研究员）





光辉的四十六年

——政协江西省委员会发展历程纪事

●罗炎卿

江西省协商委员会(即政协江西省委员会的前身),从1950年8月27日召开算起,迄今走过了46年的光辉历程。这46年,江西省政协1—7届委员会在中共江西省委的领导下,遵循人民政协章程,经历了新中国建立之初;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个历史时期,围绕各个时期党和政府的中心任务,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现将政协江西省委员会组织发展历程及其主要工作情况简述如下。

一、建国之初,江西省协商委员会代行政协江西省委员会的职权。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规定,在新中国成立伊始,江西省成立了协商委员会。

江西省协商委员会的产生及其机构

在政协江西省委员会成立之前,于1950年8月由江西省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江西省各界人民代表会协商委员会(简称江西省协商委员会),代行政协江西省委员会的职权。

1950年8月27日至9月6日,江西省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南昌市召开。会议听取了邵式平《施政工作报告》、陈奇涵《军事工作报告》、范式人《财经工作报告》。这次会议着重讨论土地改革问题,通过了陈正人《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和《江西省土地改革实施细则》。9月7日,省协商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推定33人为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会议选举陈正人为主席,陈奇涵、方志纯、刘一峰、欧阳武为副主席,刘瑞森为秘书长。

省协商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下设政治法律、财政



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委员长彭真接见五届省政协委员

经济、文化教育、土地改革等四个研究委员会和省级机关学习委员会、省协商委员会学习委员会。同时还联合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发起成立“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江西分会”。

1955年1月,由于政协江西省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活动了四年多的省协商委员会的组织形式遂告结束。

江西省协商委员会的主要任务

新中国建立初期,迅速恢复和发展遭受长期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稳定社会秩序,开展各项社会改革,为社会主义建设准备必要的条件,这是当时党和政府的主要任务。江西省协商委员会在省委的领导下,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做了四项工作。

1、协助政府开展各项社会改革运动。一是,积极投入土地改革运动,将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从政治上、经济上消灭地主阶级。到1952年底,全省依法没收了地主阶级的土地1514万余亩,耕牛11万余头,房屋107万间,全部分给贫苦农民。二是,积极投入镇压反革命运动,肃清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反革命势力,保卫革命成果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三是,积极投入“三反”、“五反”运动,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抵制资产阶级思想对革命队伍的腐蚀,清除革命队伍中的腐败分子。

2、推动抗美援朝运动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动员社会各方面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到1952年5月底,全省各界人民共捐款1589万余元,折合战斗机106架,超过原拟捐献81架的计划。1953年9月,邵式平率领由江西省各界人民代表组成的抗美援朝慰问团,前往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全省先后派出5批医疗

手术队和21批铁路工人往朝鲜支前。抗议美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反对美国侵占台湾,展开保卫世界和平签名运动等活动。

3、协商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大事项。江西省协商委员会在4年多的任期内,先后协商了全省很多有关政治、经济、文教和法律方面的重要事项。

4、推动各界人士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组织和推动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民主人士以及各界代表人士通过三种途径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一是通过个人所从事的工作和活动实践,认识社会,认识世界;二是通过政治理论的学习,包括时事政策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提高觉悟;三是通过各种社会改革和实际斗争,从接触社会、接触工农群众中吸取养份。

二、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政协江西省第一届委员会

政协江西省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于1955年1月17日至19日在南昌召开。杨尚奎作《进一步加强全省人民的团结、为完成1955年伟大任务而奋斗》的报告。本届委员会由22个界别组成,委员为159名,会上选出常委会组成人员53名。杨尚奎当选省政协主席,莫循、黄知真、刘一峰、刘之纲、许德瑗、傅肖先选为副主席,于洪琛为秘书长。

本届委员会下设学习委员会和对台、工商、社会、文教科技、政法、医药卫生等六个工作组。

1957年增补了103名新委员,同年5月3日至11日召开的省政协一届三次全体会议上,增选常委16名,增选于洪琛、郭光洲、潘式言、王德舆为副主席,补选李一平为秘书长。

政协江西省第二届委员会

政协江西省第二届委员会由22个界别组成,共有委员571人。1959年6月24日至7月3日在南昌市召开二届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会上选出常委会组成人员81名。杨尚奎当选省政协主席,郭光洲、罗孟文、黄霖、莫循、黄知真、潘震亚、于洪琛、刘之纲、谷霁光、傅肖先、潘式言、王德舆为副主席,李一平为秘书长。

本届委员会下设学习委员会、家属工作委员会、江西省社会主义学院以及文教科技、医药卫生、工商、社会、对台、文史资料等六个工作组。

政协江西省第三届委员会

政协江西省第三届委员会由22个界别组成,共有委员601名。1964年10月14日至22日在南昌市召开三届一次全体委员会议。杨尚奎作《当前形势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报告。会上选出常委会组成人员81名。杨尚奎当选省政协主席,郭光洲、黄知真、罗孟文、黄霖、莫循、潘震亚、于洪琛、刘之纲、谷霁光、潘式言、王德舆、平戎为副主席,李一平为秘书长。

本届委员会下设学习委员会、家属工作委员会、江西省社会主义学院以及科技、文教、对台、工商、医药卫生、社会、文史资料等七个工作组。

1966年7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在“一片打倒声中”,政协工作被迫停止活动,三届委员会未再履行职权。

政协江西省一、二、三届委员会主要工作任务

1955年1月,江西省一届人大召开后,作为代行人大职权的江西省协商委员会圆满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为适应新情况,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新形势下,政协江西省第一、二、三届委员会在中共江西省委领导下,主要开展了六项工作。

1、贯彻人民政协章程,调整人民政协职能。1954年12月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为适应全国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制订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简称《章程》)。《章程》取代了原来的《共同纲领》和《组织法》,规定了人民政协的性质、任务、作用以及组织机构等重要事项,成为全国各级政协进行工作和活动的准则。江西省政协认真贯彻《章程》,开展各项活动。

2、协助政府推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根据当时的形势,1955年以前主要是进行单个企业的公私合营;1956年则由单个企业的公私合营发展到整个行业的公私合营。1956年1月,全省完成企业公私合营,同年底,完成了全行业公私合营。

在这期间,省政协积极组织各界人士和工商业者进行政治学习和理论学习,并协助民建和工商联举办讲习班,组织资本主义工商业者进行学习,促进其自觉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3、协助共产党贯彻知识分子政策,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1955年,随着全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发展,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已

成为全国上下的主要任务。为了协助党委研究知识分子问题,政协在组织委员视察中,把知识分子问题列入一个项目。并将在视察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向省委反映,提出建议,为党制定知识分子政策,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积极性,提供了不少有益的材料。

4、积极推进协商、监督工作。根据中共中央、中共江西省委将有关国家政治生活、全省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重要问题,提交政协进行协商的精神,政协组织委员对农业合作化问题、农业发展纲要、宽大处理和安置城市残余反革命分子问题、关于文字改革的问题、城市建设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协商。在协商中,委员们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和建议,被党委和政府采纳。

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了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各级政协为贯彻这一方针,认真做了许多宣传和组织工作,把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向前推进了一步。

5、推广“神仙会”的自我教育方法。1960年7月,全国政协召开政治、理论学习工作会议,总结了“神仙会”的经验,提倡在学习工作上推广这一方法。随之,在我省政协系统得到推广运用,在学习工作中,敞开思想,自由辩论,互相帮助,共同提高。“神仙会”的特点是“三自”和“三不”。即: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在三年困难时期,全省各界人士能够经受国内物质生活条件十分困难和国外压力的考验,“神仙会”起了一定的作用。

6、协助政府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发生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全国国民经济发生了三年困难。中共中央于1960年冬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为了宣传贯彻中共中央的“八字”方针,省政协不断邀请省委、省政府各有关部门负责人作报告,介绍调整工作的进展情况和问题;组织各种座谈,反映各方面的意见。这对于帮助党和政府了解情况,改进工作,以及在统一战线内部了解政策,沟通思想,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同时,在三年暂时困难时期,我省各级政协根据党的统战政策,对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给予尽可能的生活上和物质上的照顾和关怀,这对促进统一战线的稳定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1978年2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标志着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中断活动的政协组织恢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不仅恢复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统一战线方针,并根据新的形势发展,又提出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作补充,发展成为新时期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人民政协工作,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进入了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新时期。

政协江西省第四届委员会

1978年2月,在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召开前,政协江西省第四届委员会产生,本届委员会由25个界别组成,安排委员752名。1978年2月13日至19日在

南昌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会议选出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105名。杨尚奎当选为政协主席,罗孟文、甘祖昌、梁达山、潘震亚、李世璋、胡德兰、刘护平、钟平、赖绍尧、谷霁光、潘式言、何世琨、陆孝彭、沈翰卿为副主席,秘书长为刘坤。

本届委员会下设三个委员会和九个工作组,即学习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提案审查委员会和科技、对台、教育、文化、医药卫生、政法、工商、民族宗教华侨、妇女工作组。四届委员会设立了中共党组。

本届二次会议以来先后增补委员76名,补选、增选常务会组成人员36名。在二次会议上,方志纯补选为省政协主席,马继孔、朱开铨、吴甄铎、李华封、倪南山、刘建华增选为副主席,补选何恒为秘书长。

政协江西省第五届委员会

政协江西省第五届委员会由27个界别组成,安排委员760名。1983年4月21日至5月1日在南昌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会议选出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108名。吴平当选为省政协主席,杨永峰、李华封、李世璋、谷霁光、何世琨、陆孝彭、沈翰卿、刘建

华、吕良、朱旦华、郭庆荣、李善元、吴永乐为副主席,刘玉瑞为秘书长。

本届委员会下设一厅、三委和11个工作组。即办公厅、学习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提案工作委员会和对台、科技、农业、教育、医药卫生、财贸金融、政治、文化、妇女、华侨、民族宗教等11个工作组。1983年10月,将各工作组的名称均取消“工作”两字,对台工作组改为祖国统一工作组;1986年9

月,该组与华侨组合并,改为“三胞”联络组;1987年9月,政治组改为法制组。1985年6月在全省各地设立了省政协地区联络处。本届委员会仍设立了中共党组。

本届二次会议以来先后增补委员75名,补选、增选常委组成人员18名。武惕

予、金立强、吴允中先后增选为省政协副主席。

政协江西省第六届委员会

政协江西省第六届委员会由27个界别组成,安排委员755名,1988年1月24日至31日在南昌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会议选举吴平为省政协主席,选举杨永峰、陆孝彭、沈翰卿、李善元、吴永乐、金立强、廖延雄、李沛瑶、戴执中为副主席。选举孙殿甲为秘书长。并选出96名常务委员。

1990年4月19日至24日政协江西省第六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南昌举行,在这次会议上,增选叶学龄、黄立贤、罗明为省政协副主席。

本届二次会议以来,先后增补委员52名,补选常委会组成人员9名。

本届委员会仍设立了中共党组。委员会下设办公厅和学习、文史、提案、“三胞”联络、经科、法制社团、教文卫体等七个专门委员会。

政协江西省第七届委员会

政协江西省第七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于1993年1月30日至2月4日在南昌市举行。本届委员会由30个界别704名委员组成,选举产生95名常务委员。刘方仁当选省政协主席,选举叶学龄、吴永乐、



省委书记吴官正、纪委书记马世昌出席全省政协会议时与原省政协副主席陆孝彭在一起

廖延雄、戴执中、黄立圻、罗明为副主席，秘书长暂缺。会议结束时，刘方仁作了《进一步做好政协工作，为加快我省改革与发展做出新贡献》的讲话。会议还通过了相应决议。

同年7月，中共中央调刘方仁任贵州省委书记，江西省政协主席一职暂缺。

1994年2月23日至3月1日，政协江西省第七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南昌举行。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补选朱治宏为省政协主席，增选梅亦龙（女）、江国镇、厉志成成为副主席，选举江国镇兼任秘书长。这次会议还通过了相应的决定、决议。二次全会以来，还补选、增选了常务委员6名。

1995年2月在省政协七届三次全委会上，接受江国镇辞去省政协秘书长兼职，补选缪兵为秘书长。

本届委员会仍设立中共党组。委员会下设办公厅，本着精减机构的精神，将原设的学习委员会和文史资料委员会并为一个委员会，设立学习和文史、提案、法制社团、“三胞”联谊、经科、教文卫体等六个专委会。

根据工作需要，1995年8月将省政协地区联络处改设为省政协地区工作委员会，12月颁布了《政协江西省委员会地区工作委员会工作条例》。

1995年12月，省政协制定了《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实施办法》，同月，中共江西省委向全省各级党组织印发了关于认真贯彻《政协江西省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政协江西省4至7届委员会开展的主要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人民政协也随之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为了适应新形势，使政协工作更好地为完成新时期任务服务，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25条意见，全国政协制定了第二部和第三部政协《章程》，1994年又对第三部政协《章程》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订，同年底召开了地方政协工作经验座谈会，总结出八条经验；1995年3月，全国政协还作出了关于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的规定。

上述这些在新时期制定的人民政协、政协工作的《意见》、《章程》，“经验”、《规定》，都是我省四、五、六、七届政协委员会在工作中、活动中遵循的指导思想 and 原则，并在实践中取得了较显著的成绩。表现出来的新特点是：

1、突出宣传了“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在实践中认识到，实现团结必须发扬民主；发扬民主，又可以进一步增进团结。对于人民政协来说，团结和民主反映了人民政协工作的本质要求，它既是工作的出发点，也是工作的归宿。

2、遵循了做好政协工作的三条原则，即“尽职而不越位，帮助而不添乱，切实而不表面”。为了实现“三原则”，认真贯彻了“四个必须”：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大局；必须注意从实际出发；必须密切同有关部门的配合。

3、紧密围绕党委和政府的中心任务履行政协职能，得到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吸引了广大政协委员以饱满的热情参政议政。

4、注重了运用例会、调查、视察、提案等方式开展活动，因地因时地赋予新的内容，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搞得更加生动活泼，富有实效。

5、更充分地发挥了省政协各专门委员会的基础性作用，注意了选择那些人民群众关心、党政部门关注、政协又有条件做好的题目，组织深入的调查研究，形成比较成熟的意见后，再反馈到党政有关部门，发挥了政协“人才库”的优势。

6、积极推进协商监督的规范化、制度化，认真搞好政协自身建设，发挥政协中共党组的政治核心作用，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作者系本刊副总编辑）

八一起义丰碑永远矗立在人们心中

南昌，素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美誉。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领导举行了震惊中外的武装起义。为这座历史古城增添了英雄的光彩。从此，南昌成了人民解放军的诞生地，被誉为“英雄城”。

南昌八一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诞生了一支新的人民军队，揭开了土地革命的新篇章，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具有伟大的意义。当年起义时的总指挥部、贺龙指挥部、叶挺指挥部、朱德创办的军官教育团和朱德旧居等五座革命旧址已成为八一起义革命精神的物质载体，象一座座伟大的历史丰碑，矗立在英雄城南昌，为世人瞩目、敬仰。

为了宣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光荣历史，颂扬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向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经中共中央批准，1956年建立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将馆址设在八一起义总指挥部旧址内。1961年该馆被国务院颁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该馆陈列分为两大类：

一是复原陈列。就是恢复八一起义总指挥部、贺龙指挥部、叶挺指挥部、军官教育团和朱德旧居及各旧址内有关起义领导者、工作人员活动房间的原貌，供人们观瞻。

——八一起义总指挥部旧址，位于中山路256号，建于1922年，原为江西大旅社。1927年七月下旬起义军来到南昌便将这座旅社包租下来，作为领导起义的总指挥部。20军第1师师部也驻在这里。一楼两侧厢房为起义

军警卫连、卫生队住房。中间的喜庆礼堂为会议大厅，领导南昌起义的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就在这里成立，并多次召开会议。大厅东侧的第9号房间为第1师师长贺锦斋的住房，西侧的第10号房间为军事参谋团办公室。二楼东侧第25号房间为前委书记周恩来的办公室，西侧第20号房间为时任财政委员主席林伯渠的办公室兼卧室。三、四楼为起义军参谋和政工人员以及随军来昌参加起义的各地工农运动的领导人的住房。

起义军挥师南下离开南昌后，这里仍为旅社。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不久由江西省人民委员会接收，并将江西省人民委员会交际处设于此。1956年成立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时，交际处撤出，将馆址设于此，并在二、三楼设置了八一起义辅助陈列。

——贺龙指挥部旧址，位于子固路95号，原为中华圣公会主办的宏道中学。前栋三层楼房为教室，后栋二层小楼为牧师兼校长及教师们的住房。因正值暑假，20军军长贺龙便决定将指挥部借驻于此。前栋为军事参谋和警卫部队住房。大礼堂为军部办公室，起义前夕，贺龙曾在此召开军人大会宣布起义。后栋一楼西边一间房子原为校长卧室，校长十分热情地让出自己的房间给贺龙住。东边两间房子分别为校长的会客室、餐厅，也让给贺龙作为会议室、会客室。起义之前，前委书记周恩来曾在会议室会见贺龙，代表前委宣布任命他为起义军总指挥。贺龙听后十分激动，立即表示党叫我怎么干就怎么干。起义前夜，贺龙曾在餐厅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宣布起义，并当众表示自己永远跟共产党走的决心。二楼为军事参谋团参谋长刘伯承和第三师师长周逸群的住房。起义时，贺龙、刘伯承、周

● 郑传云

逸群曾站在院内台阶上指挥攻打敌总指挥部的战斗，该旧址前栋大楼临街的三楼窗口上至今仍留有当年激战时的弹痕。

八一起义胜利后，贺龙率军南下。离别之前，曾将随身所带的粉彩茶具一套送给该校校长，表示感谢。成立纪念馆时，校长将这套一直珍藏在身边的茶具献出。现仍按原样，陈列在贺龙指挥部旧址内。

——叶挺指挥部旧址，位于现南昌市第二中学内，起义时该校为心远中学。也正值暑假，起义军24师师部借驻于该校一栋工字型两层楼房内。一楼为警卫部队居住、二楼中间教室为军部办公室，西南面教室为电话总机房，东南面教室为会议室。起义前夕，叶挺师长在这里召开了营以上军官会议，宣布起义，进行战前动员，下达作战命令。

——军官教育团旧址，位于八一大道104号，原江西讲武堂。1927年春，朱德奉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前来南昌，利用他在滇军中的同学、同事、师生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创办了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为革命培养军事骨干。讲武堂第三进东侧的第一间房为时任团长朱德的办公室，第二间为会议室。因形势变化，该团只办了一期，朱德率领该团第三营参加了起义。

——朱德旧居，位于花园角2号。系一座砖木结构的二层楼的旧式民宅，两个天井把整栋房屋分为前后两边，中间为厅堂。朱德任军官教育团团长时租住于此，一楼厅堂右边房间为朱德卧室。七月下旬周恩来秘密来到南昌领导起义的当天，直抵这里，与朱德商谈起义事宜，是夜，周恩来便寓居在厅堂。

二是辅助陈列。该陈列设置在总指挥部旧址的二、三楼。运用大量的文物、资料、照片、图表、模型、绘画、雕塑，全面、准确、生动形象地展现出当年起义的历史，几经修改，日臻完善。现有陈列分为四个室：

第一室为历史性的决策。这一室主要介绍大革命失败前后中国共产党对武装斗争的认识，说明南昌起义爆发的思想必然性；介绍南昌地区工农运动的基础，说明南昌起义爆发的客观可能性。

第二室为起义的前夜。这一室主要介绍领导这次起义的组织机构、干部和军队的准备。特别是前



八一起义纪念馆

委扩大会议上与张国焘的论争，九江甘棠湖上小划子会议，表现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前委及其他领导同志，坚持党的正确决定，不畏强敌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叶剑英、贺龙、叶挺等忠于党忠于革命的赤诚之心；暴露了张国焘不相信党和人民，过高估计敌人力量的右倾思想。

第三室为伟大的第一枪。这一室主要介绍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起义军2万余人在8月1日凌晨2时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战斗经过，新型人民军队的诞生，革命政权的建立，以及地方党和工农民众的积极支援、密切配合。这一枪，犹如黑夜中的电闪雷鸣，划破了中国革命的长空，震撼着中华大地，给全国人民以热切的希望和无比的振奋。

第四室为光辉的征程。这一室主要介绍起义军按原定计划南下广东潮汕，途经赣东闽西，屡遭敌人围追堵截，10月初主力失利的史实。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武装斗争认识的不足。但又通过文物、史物和照片展现了起义领导人一路上，在艰苦的行程中，在战斗的间隙里，仍在致力于建党、建军、土地革命、武装工农等有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的探索。保留下来的一部分起义军，由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经过艰苦转战，于1928年4月和毛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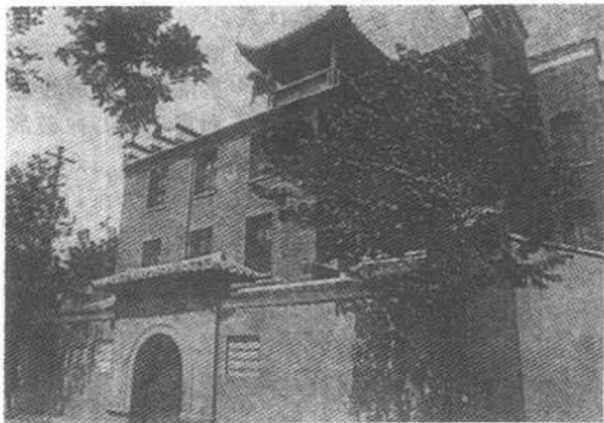
东同志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宁冈砦市会师，成立了中国红军第四军，走上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道路。

该馆开放近40年来，接待观众1000多万人次和120个国家、地区的友好人士。为加强革命传统教育，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增进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现在，每天纪念馆门前一个个，一队队慕名来瞻仰参观，自觉接受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的观众川流不息。他们来自本省市，乃至全国，有工人、农民、学生、干部、解放军。看后纷纷表示，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要向八一起义的英雄们学习，要以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榜样，刻苦学习，努力工作，多种粮食，保卫祖国，大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他们表示要发扬南昌八一起义革命精神，大胆改革，开拓进取，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献身现代化建设。

还有那些来自世界五大洲的各国友好人士，他们之中，有的专程前来学习，有的旅游观光。通过参观，了解了中国历史，增进了相互之间的友谊。他们感到周恩来等是一代伟人，南昌是个值得骄傲的城市。

特别值得该馆荣幸的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朱德、贺龙、陈毅等曾先后来馆视察，为旧址恢复、陈列展览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给予了极大的关怀，陈毅元帅亲自为该馆题写了馆名。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



贺龙指挥部旧址

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等亦相继来馆视察，一再嘱咐要保护好这些革命旧址，勉励该馆同志加强学习，热情宣传，努力搞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把纪念馆办成一座没有围墙的爱国主义教育大课堂。李鹏、刘华清还分别挥毫题词：“英雄城南昌”、“辉煌的历史、英雄的城市”。字体端庄遒劲，力透纸背。这是对八一起义历史的高度赞扬，对南昌人民的莫大鼓舞和殷切期望。

自党中央颁布《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后，南京军区、江西省委、省政府、南昌市委、市政府以及共青团江西省委、少工委相继将该馆命名为青年官兵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少先队“创五星雏鹰行动”教育基地。

40年来，该馆领导和全体同志，牢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央首长的教导，不断征集文物、资料、调整、充实八一起义历史陈列展览内容、力求更加精炼，更具感染力；热情讲解，周到服务，尽最大努力满足观众需求。现在已做到全年天天开放，中午不闭馆，每天10个小时开放。根据不同对象，不同要求，因人施讲，热情服务。特别是对来馆举行各种纪念活动，和入党、入团、入队，新兵入伍，老兵退役，等大中小学校学生、企事业单位、军队的仪式的，他们均提供便利条件，给予密切配合和大力支持。把宣传八一起义，进行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工作的主旋律，应尽的责任。近年来，中央及省、市新闻单位对该馆工作均作过报道，95年被评为全省优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明年8月1日是南昌起义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0周年。为了隆重、热烈庆祝这一辉煌节日，中共南昌市委、市政府已把旧址维修、更新陈列、改造周围环境作为一件大事来抓，一项光荣而又严肃的政治任务来完成。并对该馆建设制定了一个近远期规划。成立了以市委、市政府、南昌军分区主要领导挂帅，省、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目前已调集人员成立了办公室，分三个小组全面开展工作。决心向建军70周年献上一份厚礼。

（作者系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馆长）

苏区国家银行行长

毛 泽 民

●刘国盛 冯都

今年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诞辰 100 周年。当人们追忆起中国共产党半个多世纪财政金融发展历程时，自然会想起红色金融奠基人毛泽民的丰功伟绩，是他第一个在中央苏区统一财政，统一货币，组织建立完整的金融体系。他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培育的金融队伍，为新中国财政金融事业奠定了基础。

从先到有建奇功

1931 年 10 月下旬，时任闽粤赣军区经济部部长的毛泽民奉命来到江西瑞金县叶坪参加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11 月 7 日，代表大会正式召开，会上成立临时中央政府，他被委派筹建国家银行。接受任务后，毛泽民一面静下心来研读“一苏”大会通过的《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一面调查中央苏区财政金融的基础。他了解到：1928 年 10 月开办了江西东固平民银行，1930 年 2 月举办了福建永定信用合作社，同年 11 月成立了江西工农银行，从而建立了中央苏区初期的金融管理机构。

1932 年 2 月，以江西工农银行为基础，正式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命他的大弟毛泽民为首任行长，行址设在瑞金叶坪村的一幢小楼房里。楼上楼下共两

个小厅三个房间，楼上小厅是财政部记帐的办公室，楼上两个房间中，一间是毛泽民办公室兼寝室，另一间和小厅前的走廊就是银行职员的宿舍，楼下小厅是银行的办公室。国家银行成立之初只有 5 人，除行长毛泽民外，有从闽西工农银行调来的会计曹菊如以及记帐、出纳、杂务各 1 人。工作人员少，条件艰苦，毛泽民并不在乎，只是他看见自己所掌握的仅是一些缴获的银器、银元时，不禁愁眉紧锁。的确苏区底子薄，办国家银行困难重重。

毛泽东看出了大弟的心思，笑着对他说：“润莲呀！希钧当你的家，你当我们苏区几百万军民的家，柴米油盐酱醋茶，枪炮弹药梭镖叉，担子不轻哩！”毛泽民不高兴地说：“大哥，就这点家当办银行，叫我怎么搞法？你还开玩笑。”毛泽东告诉他，创业艰难，要统一财政，统一货币，尽量发挥苏维埃银行作用，按照市场需要的原则，发行适当数量的纸币，同时吸收群众存款，贷款给有利于革命的事业，做到有计划地调剂苏区金融。并说：“事情总是从无到有的嘛！”

毛泽民受到“从无到有”的启发，深入红军各部队，在所缴获的战利品中，将有关经济书籍、帐册、表格收集起来，给银

行工作人员办培训班。不久，毛泽民又在老表烧田契的地方捡来了一本字迹模糊的《经济学》，使他学到了不少金融理论知识。于是，他结合实际制订了会计制度、预算制度、决策制度和审计制度，着手进行了各职能机构的组建。银行人员逐渐增至 50 人，分设二处七科，即业务处、总务处和国库科、会计科、总务科、发行科、营业科、出纳科、保卫科等。在体制上，总行下辖二个省分行、一个瑞金直属支行和四个兑换处，五个金银收买处，即福建省分行、江西省分行和福建白砂、南阳、江西兴国、瑞金总兑换处以及白砂、南阳、瑞金、兴国、会昌收买金银处，还在各县苏政府和各军经理机关设立了几十个代兑处，初步形成了独立完整的金融体系。

毛泽民根据银行简章，确定办行宗旨：一是摧毁反动的金融体系，废除高利贷剥削，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二是打击奸商的破坏活动，防止金银外流；三是统一货币制度，建立自己的造币厂，发行适当数量的纸币；四是开办机关、企业、红军部队和个人的储蓄，扩大银行股金；五是经济效益好的厂、矿、合作社发放贷款，扶植各项建设事业；六是改善经营管理，从宏观上调剂资金余缺；七是办理兑换业

务，管理现金，并代理金库；八是组织信用社，帮助工农群众兴办各种生产合作社；九是保障贸易，繁荣市场，稳定物价，安定人民生活，为革命战争服务。

毛泽民牢记马克思关于“对银行来说，具有最重要意义的始终是存款”的教导，大力组织存款，将没收、税收、捐款、罚款、盈利等款项聚集到金库，办理机关、企业、红军部队和个人的储蓄。如毛泽民给金总执行局刘少奇委员长的信说：“储蓄可以鼓励广大工农群众在日常生活中从事节省，将所节约的零钱大家存入银行，使得聚少成多，化零为整。”同时加强现金（即银元）管理，严格要求各级政府和地方武装，必须将所得的现金完全汇交国库，金银币应兑换成苏维埃货币才能流通。并制订《现金出口条例》，控制金银币外流。此外毛泽民还主张苏维埃国家银行实行低息贷款，发展信用合作社和贫民借贷所，由群众自

己集资，自己管理，千方百计扶助农工商业的发展。

毛泽民在就任国家银行行长期间，注意利用中央苏区的自然资源，发展生产，开展对外贸易，打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他请示临时中央政府批准，在赣南会昌县铁山垅成立“中华苏维埃钨砂总公司”，并亲自兼任经理。毛泽民这一行动，却遭到“左”倾分子的指责。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李德也反对办钨矿，极力主张大量印纸币、印公债，用日夜开动印刷机来解决财政金融的需求。他对毛泽民说：“你在上海当过印刷厂厂长，你现在不印钞票，而去挖钨矿，不务正业。”毛泽民压力很大，去问大哥怎么办？毛泽东说：“发纸币，发公债券，银行变成纸行了。我看还是要靠金山、银山，才有靠山。要发展经济，才能保障供给嘛！”毛泽民在大哥的支持下，坚持大挖钨砂，到1934年发展到三个矿场，约5000

名职工，产值200多万银元。由于赣南大量出口钨砂，卖给广东、香港，为中央苏区换进了大批急需的食盐、布匹、药品、煤油、火柴、电池、工业品和军用物资，繁荣了苏区经济，缓和了军民供给，沟通了赤白之间的贸易。这时毛泽民又提出银行要重点贷款给32个国营工矿企业发展生产，同时扶植手工业，以便支持前线的军事斗争，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在不足三年的时间内，毛泽民从白手起家，建立起中央苏区财政金融体制，使中央苏区财政经济一度出现可喜的局面。中央政府项英副主席曾经称赞说：“苏区财政金融的统一，是毛泽民同志的一大功劳。”

呕心沥血造货币

建立国家银行必须首先拥有自己的货币。然而当时有人觉得这项工作太艰巨了，对毛泽民说：“毛行长，我们自己制造货币的条件还不成熟，市面上不是已有现成的货币吗？先将就几年再



一九三二年二月八日毛泽民在瑞金县叶坪的这座民房里创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并任行长。